

怀特海德新作《尼克尔少年》： 探寻历史 质问现实

□林莉



《尼克尔少年》英语版封面

编

新不如述旧，刻古胜雕今。历史往往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楚地认清现实。《尼克尔少年》(The Nickel Boys, 2019)在美国上下掀起黑人示威运动前两个月获奖，这部由美国著名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海德(Colson Whitehead)撰写的关于美国白人狱警与黑人少年之间的故事无疑激起人们对作品内容更多的兴趣，同时也对小说揭露的曾经的美国历史和当今的美国现实产生更加深刻的思考。正如小说开篇第一句话所指出，这些美国黑人“孩子即使死了也在制造着麻烦”。

小说的名字《尼克尔少年》瞬间将读者带入无限的隐喻空间。nickel本身的意思是指美国的五分硬币，即美国货币中价值最低、最不值钱的一个货币。怀特海德用The nickel boys作为书名，明显是在控诉美国黑人在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总是被人像对待五分硬币一样轻视。“尼克尔少年比‘十美分跳支舞’还廉价，你的十美分在他们身上会得到更多，正如少年们经常说的一样。”然而，笔者将这部小说翻译成《尼克尔少年》是因为小说的发生地的名字是“Nickel School”，是美国南部一所劳教学校，主人公及里面的学生也基本上是即将年满18岁的少年。

作者科尔森·怀特海德在致谢信中解释，尽管这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均属虚构，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2014年作者在《坦帕湾时报》中读到的一篇报道说，南佛罗里达州玛丽安娜市州立亚瑟·多齐尔男子学校那些被折磨、强奸和肢解，然后被埋葬在一个秘密墓地的该校学生的遗骸(Whitehead 211)。亚瑟·多齐尔学校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真实学校，其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恐怖存在直到2011年才结束，甚至在怀特海德的小说付印后，仍有学生的坟墓在被不断发掘和发现。2019年3月份最新证据认为，该校学生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80人以上。

作家怀特海德十分擅长讲述故事，他不仅试图挖掘悲伤的过去，同时也是在审视美国人如何破坏、歪曲、隐藏或“巧妙地抹去”曾经的美国有关黑人历史。在这部看似情节简单的小说中，作者却融合了许多多美国黑人小说或有关黑人小说中的黑人形象。《尼克尔少年》和《哈克贝利历险记》一样，主人公是两位无父无母的少年。其中一位是马上18岁的埃尔伍德·柯蒂斯，童年即被父母遗弃给祖母照顾，祖母哈丽特是一家白人经营的高级酒店塔拉哈西酒店的清洁女工，她性格坚强，勤劳肯干，为人正直守信。这位坚强的祖母总是让人想起托尼·莫里森小说《宠儿》中的祖母贝比·萨格斯，义无反顾、任劳任怨地承担起照顾全家的重任。祖母工作时会让外孙子在酒店的后厨玩耍。祖母对埃尔伍德管教十分严格，从小教他做一个勤劳的好人。外孙子也是这样做的，学习优秀，并准备进入大学学习。但是仅仅由于假期去课外班时错过了别人偷的车，就被指控为窃车贼，并被送进尼克尔劳教学校。

其实，哈丽特和埃尔伍德的家族史包含更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小说的历史背景中展开是美国隔离法律吉姆·克劳法案在南方盛行时。吉姆·克劳法(Gim Crow Laws)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括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这些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强制公共设施必须依照种族的不同而隔离使用，且在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下，种族隔离被解释为不违反宪法保障的同等保护权，因此得以持续存在。但事实上黑人所能享有的部分与白人相比较往往是较差的，而这样的差别待遇也造成了黑人长久以来处于经济、教育及社会上较为弱势的地位。哈丽特的父亲“在市中心因为一位白人女士指责他在人行道上不让路后，死在监狱里”。她的丈夫，埃尔伍德的外祖父，在一场轰隆隆中被杀，旁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堆塔拉哈西饼干。“她的女婿，埃尔伍德的父亲，二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区服役。他热爱军队，甚至给上尉写了一封关于对有色人种不公平的信。”怀特海德写道。但后来他回家发现，即使是国税法案也无法推翻一个棘手的现实：“当一家白人很

行不让你介入时，最不感兴趣的贷款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和埃尔伍德的母亲生活在一个“白人男孩”容易“私刑化穿制服的黑人男子”的小镇上，在儿子6岁时，他和埃尔伍德的母亲半夜去加利福尼亚，从此甚至没给留下来的年幼的儿子寄过一张明信片。除了人物刻画的独树一帜，在小说的情节和叙事上，作家怀特海德从不让读者对他即将出版的小说的文本类型有任何预期的满足感。他一直在不断地创新自己的小说叙述模式。“我想我只是不想一次又一次地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在一个层面上，每本书都成为一种解药，来解药之前的一本。这我可以挑战自己：我能写一本情节较少的书吗？我能学习恐怖小说的规则，并使之适应我自己对世界的关注吗？我能写一本不会让我想起我讨厌的成人小说吗？所以我尽量保持新鲜。我只是想不让自己觉得无聊。如果我能写侦探小说，如果我能写恐怖小说，那为什么还要写呢？为了使工作富有挑战性，我必须继续前进。”

可以说，小说《尼克尔少年》的情节让读者意识到已经屡获美国文学大奖的怀特海德开始向美国文学经典致敬，小说的结构分成序言、正文、后记和致谢四个部分。和《红字》及《白鲸》一样，小说的序言将读者带到一种真实的历史氛围中，后记更是让原本虚构的文本情节显得更加真实。最后一部分的致谢，作者直接指出小说内容的创作来源，进一步说明小说虚构内容的历史真实性。这种颇具历史原小说特性的叙述结构全方位地验证了经过8部小说的控制开始游刃有余。“在纽约居住着一位叫做埃尔伍德·柯蒂斯的曾经的尼克尔学校学员。他会偶尔地在网上搜一下关于那座曾经的劳教学校的消息，查看一下是否有最新进展，但是，出于很多原因，他从不去参加这所学校的校友会，也不把自己的名字加到校友名单当中。有什么意义呢？大家都是成人了。”这是小说的序言中的表述，直接将读者带入到小说的情节之中。

除了对美国白人主流文学叙事手法的继承之外，怀特海德更多地借鉴了美国黑人文学的重要作品。例如，小说的主题不难看出《土生子》和《看不见的人》的影子。小说的第一章，作者是这样介绍他的主人出场的：“1962年的圣诞节，埃尔伍德收到了他此生最好的礼物，尽管这个礼物放置到他头脑中的思想正是他悲惨命运的来源。《马丁·路德·金在锡安山》是他拥有的唯一的唱片，自此他从未离开过唱机……金博

士的演讲是如此生动的编年史——里面包括了所有黑人曾经的历史和未来的状态——这个唱片几乎和电视一样美好了。”埃尔伍德从小就十分善良、听话，他为人诚实本分，从不与淘气捣蛋的小子们玩耍。他最大的梦想是有一天，他也可以像其他的白人孩子一样，去美国的游乐园玩玩。因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是不能进入游乐园的。他热爱读书，梦想着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学习。他甚至利用自己的假期在杂货店里打工赚到了一些自己上学的学费。小说的第一部分(第1-3章)就是这样有条不紊地叙述了一个在正常的环境下长大的黑人好孩子埃尔伍德，简直就是黑人小说《看不见的人》中主人公“我”的翻版。然而，小说的第二部分(第4-10章)，由于在试图去暑期学校学习的路上搭错汽车，从而被误判为偷车窃贼，他不得不进入尼克尔劳教学校学习。在那里，一心想做好人的埃尔伍德亲眼看到了这种劳教学校的种种黑暗。例如，学校里的老师克扣学生的饭菜、零食甚至是冰淇淋，将它们卖给周围的饭店、杂货店等。他们利用劳教学校里的学生让他们做免费的劳工，给学校赚取外快。不仅如此，学生们稍不留神，可能就会招来狱警老师们的鞭刑甚至性侵犯。即使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埃尔伍德依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早日得到释放返回家乡，重新上大学。因为他牢牢地记住了马丁·路德·金博士告诉黑人在美国社会的非暴力不抵抗原则。然而等待他的终于还是被狱警老师鞭打后试图逃跑过程中中枪而死。埃尔伍德不幸的命运和另外一部美国著名黑人小说《土生子》的内容有十分近似的地方。小说的第三部分(第11-14章及后序和致谢)，叙述另一名黑人男孩特纳以埃尔伍德的名义在纽约生存的后尼克尔学校生活。这时候这个隐姓埋名实为特纳的埃尔伍德对待生活的态度已经与《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老实黑人汤姆无异，或者作者就是在告诉世人，和近150年前一样，黑人想要在美国社会生存下去的惟一途径就是像曾经的汤姆叔叔一样逆来顺受。

从小说内容的细节上看，埃尔伍德出生于一个南方小镇，从小就按照白人的价值观来塑造自己，希望能从这个充满敌意的社会找到自己人生的位置。埃尔伍德从小勤奋，热爱读书，是班里每年成绩最好的好学生；他从不与街头闲逛的黑人小孩一起玩，课余时间在一小杂货店打工，挣的工资全部交给奶奶，一半补充家用，一半用来攒学费。他尤其喜欢马丁·路德·金寻求黑人政治独立的演讲，心中支撑他的精神

理念一直是其中的一句：“我们必须发自内心的相信：我们也是人物，我们重要、有价值，我们必须每天从街上走过，带着一种尊严感，认为我们自己也是一个人物。”埃尔伍德反复听这段录音，认为金博士给予自己认定的行为准则以形式和意义。“社会上有很强大的力量想要压制黑人，如吉姆·克劳法。也有一些小势力想要压制你，如其他人。在面面对所有这一切时，你必须站直，认清自己是谁。百科全书(黑人历史)是空白的。有人陷害你，微笑着想把空白扔给你，其他人则会剥夺你的自我尊重。你自己需要记得你是谁。”这个少年的行为准则一直都是做个好人。

小说的第三部分(第11-14章及后序和致谢)的时间跨越了几十年，地点也不再是尼克尔学校，而是在纽约的哈莱姆区开了一家搬家公司黑人老板埃尔伍德·柯蒂斯。而其实这个埃尔伍德只是化名的特纳。特纳和埃尔伍德是尼克尔学校的同学。但是与埃尔伍德的锋芒毕露不同，特纳沉稳、内敛，却拥有自己条理清晰的所有计划。“就像一棵倾倒在溪流上的树干——它不属于也不远离。在大的洪流中形成自己的小波浪。”他非常了解这所学校的所有运行机制和黑暗面，却从不加以评论，只是处处保护帮助新生埃尔伍德免受惩罚，并利用这所学校的规则做一点有益于自己的事。“尼克尔学校里面的运行和外部的运行机制一样。你需要观察人们如何行为，然后你思考出如何和他们打交道，就像你知道如何处理机器故障。”特纳和埃尔伍德一样，也都是从小失去父母，少年时由于在球场给白人跪着擦鞋捡球受到嘲笑，他将人打伤被送到尼克尔劳教学校；逃出后他隐姓埋名，再次用他的隐忍在纽约辛苦工作，直到几十年之后他已经拥有自己的10辆运输车、付了10年租金的房子、自己的公司和女朋友。他认为自己已经可以和白人一起在星级宾馆吃饭了，他认为已经足够了。“他饿了时，宾馆服务人员24小时服务，这就足够了。”

《尼克尔少年》表面上是描写美国一所劳教学校的悲剧故事，但实际上，作者真实地描述了大量美国的社会景象及其特征，尤其是非裔美国人在社会上所经历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这部小说充满了对美国黑人生活多方面的细致入微的观察，使人们了解难以在其他著作中了解的社会事实。小说同时为读者塑造了一个不同于之前黑人文学中所有人物的新的黑人艺术形象，从而在美国黑人文学史上树立了一个新的现实主义的里程碑。

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 “微寄生”与“巨寄生”

□张海榕 赵李震

合医学社会史，抓住特定时代的主要事件，凸显三个历史性时段：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200年间欧亚文明时代的疾病大交融；公元1200年至1500年间蒙古帝国时代颠覆旧有的疾病平衡；1500年至1700年跨洋交流时代疫病的传播，升华本书的中心思想，即瘟疫与人类进程的交融。

疫情扩散无意间成为控制人口增长的无形工具。欧亚大交融时期，麦克尼尔另辟蹊径，认为公元前430年雅典和斯巴达争霸战中雅典失败的原因并非局限于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天花与麻疹导致近四分之一的雅典官兵死亡，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瘟疫改变了地中海后续的政治史。这段时期，人类各族群已经进化完成，“完全现代型的人”出现，使得地球上的生物平衡急剧改变，人类食物、水源和住所改变以及人际交流频率和范围，影响着疫病的模式。人类活动和人口激增让潜在病原体找到机会，一场瘟疫与人类的追逐赛开始。此外，作者也在书中提到，农牧业兴起后，人类生存空间进一步得到扩展，随之“神秘”的传染病和人类间的“同类征服”共同抑制着人口暴涨。譬如，天花、麻疹等疫病对印度种姓制度产生的影响及印度“看似富足，实则贫弱”的原因。

疫情扩散也可以成为推动宗教改革的利器。公元1200年至1500年间伴随蒙古帝国的扩张，鼠疫杆菌等致命微生物轻易穿越河川等天然屏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欧洲鼠疫大流行，东、西方传染病各不相同的模式再次失衡。出人意料的是，疫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蒙古帝国扩张计划的失败。该短时间内的疫情对欧洲的影响应该一分为二：一方面，疫病使得欧洲蒙上了近一个世纪的死亡阴霾，社会经济的金字塔随之各不相同的方式调整着结构；另一方面，疫病暴露西方传统宗教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西方社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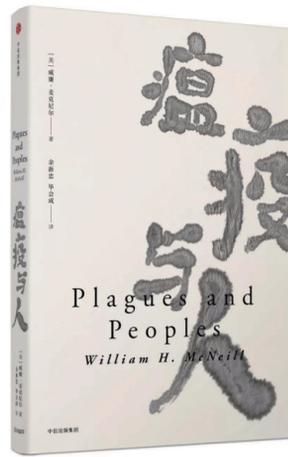
宗教变革。因此，麦克尼尔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想法：疫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欧洲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宗教改革，为后期欧洲走上殖民大扩张道路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

疫情控制也可以作为征服异族的武器。到了跨洋交流时代，欧洲多年的疫病防治经验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欧洲人将传染病引入北美洲，不仅危害殖民地部落性命，传染病还摧毁了大部分殖民地人们的信念，可谓一箭双雕。譬如，西班牙军队在攻占阿兹特克帝国的战役胜利中，天花就在占领中起到关键作用，欧洲人对于北美洲的占领不仅仅是武力上的，更重要的是疫病蚕食了美洲印第安人的信心。这一时期，人类疾病出现均质化，生态适应性调整告一段落，即“世界各地的致病微生物与人类共生模式更趋稳定，疫病主要以儿童病、地方病的形式出现，流行频率增加，杀伤力减弱，以文明族群的大规模成长，和疫病隔离群落的加速崩解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疾病形式逐渐形成”。

在医疗系统逐渐健全的现当代社会，疫苗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与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使得疫病在发生的同时，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更有效的控制。但是，麦克尼尔呼吁人类决不能对传染病的影响置之不理。人类的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发生改变，唯人类面对疫病的无助，则是亘古不变。

瘟疫的暗喻：微寄生与巨寄生

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定义了瘟疫的两个重要概念：“微寄生”与“巨寄生”，因为大多数世界上的生命都生活在“一种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所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微寄生”是指微寄生生物与其宿主的寄生关系，如病毒、细菌或多细胞生物，它们寄生在宿主，如人



体中，从中找到自己的食物源；“巨寄生”是社会化的“微寄生”，是人与人之间的寄生关系。一部分人成为“寄生物”，这些人则将找到另一部分人成为宿主，从而找到自己的生存之地，这种关系源于外部的种族征服与阶层关系，从而形成了社会平衡。因此，麦克尼尔认为：“只有当食物的生产成为某些人类社群的生活方式时，一种较温和的巨寄生方式才成为可能。”

从微寄生视角来看，当微寄生生物寄生于宿主，一场“食物争夺战”就开始了。微生物看不见摸不着，不受人控制，麦克尼尔认为：“几乎所有的微寄生生物都小得无法用肉眼看见，这意味着在显微镜和其他复杂的、帮助人类提高观测力的发明出现以前，没有人能理解或采取很多措施来控制与此类有机物的接触。”

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视角来看，尽管人类的智慧在处理他们看得见的并可实验的对象上显得得心应手，但是，直到19世纪，同微型寄生物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生物性层面上，也就是说，人类无法有意识地控制这种关系。微寄生生物在宿主身上快速找到食物源，使得寄生物与宿主的关系呈现出三种可能：一是，微寄生生物可能破坏宿主的免疫系统，甚至杀死宿主；二是，宿主的免疫系统工作并且杀死这些微寄生生物；三是，在一定情

况下，微寄生生物在宿主体内获得平衡，使得宿主成为带菌者，传染给其他宿主，形成“大流行”疫病。

从人与人的关系视角来看，麦克尼尔则引入了第二个概念：巨寄生。“巨寄生生物”呈现出类似的多源性关系。大型天敌与同类相食是人类遭遇的主要的巨寄生现象。一方面，由于早在远古时期，人类的捕食和狩猎技巧早已超过其他大型动物，因此在一定层面上，人类已然站在食物链顶端，大型天敌的巨寄生现象基本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同类相食”却在人类攀上食物链顶端后，成为主要的巨寄生方式。例如，征服者从生产者那里攫取并消费食物，由此成为靠生产者而生的新型寄生者。这种巨寄生关系一直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寄生者”从“宿主”处妄图获取食物而生存，从而导致人类间的征服与统治时常上演。

“巨寄生”概念被提出后，威廉·麦克尼尔备受争议。评论家约翰·诺瑞斯(John Norris)曾批评道：“他把疾病和被统治的不幸进行类比，荒诞地歪曲了历史。”麦克尼尔辩驳道：“这不是一种类比，而是实际存在的。在人类身处的社会系统中，‘我’在哪里获得‘食物’，即‘我’的生存资料是什么；‘我’又为谁所‘食’，即‘我’创造了何种生产资料为谁所用。”事实上，麦克尼尔将病菌的存在与传播途径细化不仅是为了讲解疫病的传播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将疫病传播方式作为一种比喻，类比人类的顽疾：权力与欲望。强者蚕食弱者，巨寄生由此成为征服与统治的代名词。

随着当代医疗手段的进步，有害的寄生关系在逐渐健全的公共卫生制度下大部分得到有效控制；但有害的巨寄生关系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因为人的沟壑难填的欲望往往催生征服。

古往今来，随着人类活动不断拓展，人类随着行动疆域的不断拓展，也带着微寄生病毒不断拓展，潜藏的病毒由于脱离动物宿主被带入阴暗的角落，伴随着人类交往，进行传播，甚至在某个历史阶段，借助某种架机的催化演变为瘟疫。

由此看来，《瘟疫与人》将世界历史中人类与疫病的关系串联起来，激励读者思考疫病与人类发展关系的同时，揭示人与人之间“疫病”式寄生，解剖人类共生关系，带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新冠病毒全球肆虐，时刻提醒人们需保持对未知的敬畏，用谦卑的心预防治理。只因，“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多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此次疫情可被称为“全球大流行”。瘟疫并非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遭遇到的全球性疫病，它是某种病原体在人类机体上成功搜寻到食物，宿主因此受到感染甚至威胁生命，疫病一旦流行，将在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同时，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

瘟疫与人类社会发展如影随形，甚至出现可能改变历史的结局。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ardy McNeill)在其非虚构作品《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 1976)中首次将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与疫病影响相结合，借助自身深厚的世界史研究功力以及敏锐的观察力和推理力，道出瘟疫如何影响人类迁移、人口变化、政治变革、宗教兴衰、医疗卫生制度建立等方面，从而直接或者间接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该书作品一经面世，就被称为“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史学佳作”，进而《纽约书评》称“此书从此扭转了人们看待世界历史的角度”。

威廉·麦克尼尔认为，瘟疫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及决定因子。在其另一著作《西方的兴起》中，麦克尼尔已开始关注疫病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但还只着眼于人口数量变化，反而在《瘟疫与人》讲述疫病的过程中，他首次将病菌与人类的微寄生关系暗喻为人类的巨寄生关系，借病菌依附于宿主而存在与传播的微寄生关系，道出人类真正的顽疾是“权力与欲望”的巨寄生关系，以独特的视角揭示出世界上生态平衡与食物链关系的本质——即征服与统治，引发读者对疫病与人类关系的反思。复旦大学黄红霞进而谈到：“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扩大了对瘟疫的关注点，利用共生圈理论和互动的观点，横跨上古农业时代到近代医学实践时代，书写了一部不同时代传染病、病菌与人类的‘互动史’。”

疫病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

从叙事手法来看，《瘟疫与人》采用历时性书写的方式叙述瘟疫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从人类史前文明狩猎时代开始，直到近现代，演绎出瘟疫与人类社会的交融过程。麦克尼尔采用全球史观，结